

## 20 世纪 50 年代英希土三国互动与塞浦路斯问题的复杂化\*

张晨锴\*\*

**内容提要** 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民族矛盾与大国争端交织的国际问题，而 20 世纪 50 年代则是该问题出现并发展为国际热点问题的关键时期。1951 年希腊对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的介入导致塞浦路斯问题出现，并引发了希腊与英国殖民统治者就该问题的分歧。为迫使希腊放弃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1955 年英国通过“三国伦敦会谈”让同样关注塞浦路斯且反对塞浦路斯主权转移的土耳其正式介入塞浦路斯问题。随之该问题由英希双边问题演变为更加复杂的英希土三方问题，引发三国就相关问题的争议与矛盾，进而造成 1957~1958 年塞浦路斯与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塞浦路斯问题也因此一举成为当时最为棘手的地区与国际问题之一。虽然该问题在 1959 年随着各方就塞浦路斯的“独立”达成共识而告一段落，但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英希土三国博弈所造成的塞浦路斯民族问题与大国干涉问题，仍是日后塞浦路斯问题多次发酵并引发当地和地区局势动荡，以及导致塞浦路斯最终分治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塞浦路斯问题 英国-土耳其关系 土耳其-希腊关系 英国-希腊关系 北约

20 世纪 50 年代是塞浦路斯问题出现并发展为国际问题的关键阶段。在冷战背景下，这一时期英希土三国互动与相关政策演化导致塞浦路斯问题出现与复杂化，最终令塞浦路斯问题演化为引起地区与国际局势紧张的热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

\*\* 张晨锴，塔里木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讲师。

点问题。然而在塞浦路斯问题的相关研究上,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塞浦路斯问题的激化,却对50年代三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互动着墨不多,而恰是这一时期奠定了三国互动机制和该问题的演进方向。<sup>①</sup>因此,对20世纪50年代塞浦路斯问题的发展以及英希土三国互动关系的研究,既是对国内冷战史研究的补充,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塞浦路斯问题的出现、发展及其解决难点。本文通过解读大量有关20世纪50年代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手史料,结合相关专著、论文成果,较为完整地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英希土三国互动与塞浦路斯问题的复杂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50年代三国互动与相关政策演进对后续塞浦路斯问题的影响。

## 一 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背景与早期英希土对塞政策

希腊、土耳其与塞浦路斯的历史联系,以及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是塞浦路斯问题形成并发酵的重要历史背景。

首先,希腊民族与文化对塞浦路斯产生了深远影响。约公元前12世纪,来自小亚细亚与爱琴海的希腊人开始移居塞浦路斯。来到塞浦路斯后,这些希腊移民没有被当时发达的本土文明所同化,反而通过与当地人口和文化的融合,逐渐衍生出了“塞浦路斯希腊族”这一新的身份,并在公元前

①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 Robert Holland, *Britain and Revolt in Cyprus, 1954-195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reas Varnavas, *A History of the Liberation Struggle of EOKA (1955-1959)*, trans. Philippos Stylianou, Nicosia: C. Epiphaniou Publications, 2004; Tabitha Morgan, *Sweet and Bitter Island—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Cyprus*,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10; David French, *Fighting EOKA—The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 on Cyprus, 1955-19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N. C., “Cyprus: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The World Today*, Vol. 15, No. 4, 1959, pp. 137-147; Cemal Yorgancıoğlu and Şevki Kırıl, “Turco-British Relations, Cold War and Reshaping the Middle East: Egypt, Greece and Cyprus (1954-195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19.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何志龙《塞浦路斯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3;何志龙《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商务印书馆,2005;何志龙《列国志·塞浦路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何志龙《“一带一路”国别概览·塞浦路斯》,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9;张晨锴《塞浦路斯问题与土英关系研究(1950-1983)》,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20;张晨锴《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探析》,《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2期;高成圆《土耳其官方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话语构建与转变(1950-1960)》,咎涛主编《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第175-199页。

11~前 10 世纪发展出了与之对应的以希腊文明为核心的“泛塞浦路斯人共同文化”，从而给这座岛屿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希腊烙印。<sup>①</sup> 在经历了亚述、埃及、波斯等帝国或王朝的统治后，希腊化时代的到来与罗马、拜占庭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最终奠定了塞浦路斯希腊族的东正教信仰，以及希腊民族与文化对该岛的强大影响力。<sup>②</sup> 这也为日后希腊民族回归运动在塞浦路斯的兴起，以及希腊介入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埋下了伏笔。

其次，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确定了土耳其与塞浦路斯的紧密联系。随着 1571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当地人口结构与文化逐渐发生变化。到英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塞浦路斯之时，当地穆斯林人口数量已达 45458 人，约占总人口数的 1/4，<sup>③</sup> 这个占比已经远超出少数民族范畴。同时，受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相关宗教与法律制度限制，土耳其人虽长期与希腊族共处，但并未出现民族与文化融合现象。<sup>④</sup> 希腊族依旧认可东正教信仰与希腊文化，而移居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最终逐渐发展为信仰伊斯兰教、认同土耳其身份的当地第二大族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从而构成了塞浦路斯人口与文化二元论的基础，土耳其也因此与塞浦路斯产生了强烈的人文联系。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塞浦路斯主权，土耳其仍保持着与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互动。<sup>⑤</sup> 而保障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权益，也成为日后土耳其官方反对塞

① 参见 Maria Iacovou, “The Greek Exodus to Cyprus: The Antiquity of Hellenism,”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4, 1999, pp. 1-28; Ioannis Voskos, A. Bernard Knapp, “Cyprus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risis and Colonization or Continuity and Hybrid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12, No. 4, 2008, pp. 659-684。

② 参见 Panos Christodoulou and Evanthis Hatzivassiliou, eds.,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yprus*, Nicosia: Open University of Cyprus, 2013, pp. 17, 45-58, 61-82。

③ 1881 年，英国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人口普查，参见“Report on Census of Cyprus, 1881, Appendix, by F. W. Barry, Superintendent of Census and Sanitary Com.,” December 1884, *19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884-1885*, Vol. 53, C. 4264。

④ Clement Dodd,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Cyprus Confli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2。

⑤ 失去塞浦路斯主权后，土耳其仍向塞浦路斯提供小规模教育援助，例如派遣教师，并为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学生进入土耳其大学提供便利。而土耳其族则自愿接受土耳其国内的改革，例如当 1928 年土耳其国内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作为土耳其语时，新字母表很快被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采用。参见 Muzaffer Ercan Yilmaz, “Past Hurts and Relational Problems in the Cyprus Confl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 27, No. 2, 2010, p. 41。

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并介入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要理由之一。

最后，英国统治时期是塞浦路斯问题形成的关键阶段。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伴随着希腊民族回归运动在当地的兴起。1832年，随着希腊王国的建立，“梅加利思想”（Megali Idea）<sup>①</sup>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希腊民族聚居地产生影响，并逐渐产生了一场名为“意诺西斯”（Enosis，与希腊合并，后来主要用来特指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后文都将用“希塞合并”表示）的希腊民族回归运动。但出于对奥斯曼帝国暴力镇压的担忧，该运动直至英国接管塞浦路斯后才在当地兴起。1878年，为防止俄土战争后俄国控制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大片奥斯曼帝国领土，从而威胁英国通往印度、苏伊士运河以及中东地区的航路，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秘密签订《英国与土耳其防御联盟公约》（以下简称《英土公约》），<sup>②</sup>利用协助奥斯曼帝国抵御俄国侵扰的条件，换取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和使用权。因为英国在1864年将爱奥尼亚岛归还希腊，所以希腊族认为英国同样会同意希塞合并，于是在英国接管塞浦路斯后，希腊族向英国提出了这一民族诉求，并在日后展开相关行动。<sup>③</sup>但希腊族的诉求不仅与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战略需求相冲突，还引起了当地土耳其族的不满。<sup>④</sup>塞浦路斯希腊族与英国殖民者、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逐渐就塞浦路斯未来地位产生争议，形成了塞浦路斯问题的雏形。

塞浦路斯问题正式出现前，英国对希塞合并等塞浦路斯事务的相关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接管之初，英国在塞浦路斯相关事务上实行较为包容的政策。对于“希塞合并”，英国承认希腊族民族意愿的合理性，并

- 
- ① “梅加利思想”是一种将所有希腊人联合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该思想引发了一场希腊民族回归运动，参见 Sevki Kiralp, *National Identity and Elite Interests: Makarios and Greek Cypriot Nationalism (1967-1974)*, PhD dissertation, Keele University, 2014, p. 118.
- ② 《英国与土耳其防御联盟公约》及《英土公约附件》，参见 Murat Metin Hakki, *The Cyprus Issue-a Documentary History, 1878-2007*,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07, pp. 3-5.
- ③ “Cyprus.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yprus,” April 1908,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08, Vol. 71, Cd. 3996, p. 7.
- ④ 1907年，当时的议员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访问塞浦路斯。在丘吉尔到达塞浦路斯后，希腊族组织了示威游行，许多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走上街头，挥舞希腊国旗，高呼“希塞合并”。此举引起了土耳其族的不满，土耳其族代表在对丘吉尔的欢迎致辞中表达了不满之情。参见“Cyprus.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yprus,” April 1908,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08, Vol. 71, Cd. 3996, pp. 3-6.

给予希腊族相关言论自由。但同时英国以《英土公约》规定塞浦路斯主权仍属奥斯曼帝国，英国无权决定该岛未来地位为由，回绝了希腊族的诉求。<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英国对塞浦路斯相关政策发生转变。在接管塞浦路斯后，英国经考察发现，塞浦路斯在当时无法完全满足其军事方面的需求，当地既没有可容纳大型船舰的深水港，也缺乏足够的军事设施。因此，英国认为塞浦路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最大价值是可以当作筹码，用于实现某些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sup>②</sup>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决定加入同盟国对协约国开战，作为回应，英国撕毁《英土公约》，单方面宣布吞并塞浦路斯。<sup>③</sup> 1915 年，为防止保加利亚参战，英国政府决定将塞浦路斯主权售卖给希腊，以换取希腊加入协约国对同盟国开战，这也是距离实现希塞合并最近的一次。然而，受亲德的康斯坦丁国王影响，当时希腊并不想被卷入战争。而当 1917 年希腊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时，这则提议已被英国作废。<sup>④</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管理政策更加严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塞浦路斯在英国对阿拉伯战线的干预中凸显了其价值所在。因此，伦敦开始强调该岛作为塑造整个中东地缘政治平衡的重要性，以及英国留在塞浦路斯的必要性，<sup>⑤</sup> 这也基本奠定了英国未来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等相关事务时的主要基调。1920 年，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色佛尔条约》，其中承认 1914 年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吞并，<sup>⑥</sup> 但该条约还未完全实施便

① “Cyprus: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yprus,” June 1881, *19th Century House of Lords Sessional Papers*, 1881, Vol. 18, C. -2930, p. 105.

② Robert Holland and Diana Markides, *The British and the Hellenes—Struggles for Master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850–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6. From “Chiefs of Staffs Paper on the Mediterranean,” October 28, 1912, ADM 116/3098.

③ “Colonial Reports—Annual. No. 865. Cyprus. Report for 1914–15,” October 1915,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14–1916*, Vol. 43, Cd. 7622–56, pp. 40–41.

④ “Commons Sitting of Wednesday, 28th July, 1954,” July 28, 1954,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Fifth Series, Vol. 531, p. 526.

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塞浦路斯在为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提供食品等相关必需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 Antonis Klapsis,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yprus and the Prospect of Union with Greece, 1919–1931: The Greek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Vol. 41, No. 5, 2013, p. 767.

⑥ 《色佛尔条约》，参见 “Treaty of Sèvres and Lausanne,” <https://www.fransamaltongveu-sau.com/documents/dl1/h1/1.1.18.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 7 月 1 日。

被《洛桑条约》取代。1923年,协约国与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签订《洛桑条约》,其中承认了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所有。<sup>①</sup>1925年,英国宣布塞浦路斯成为其直辖殖民地,塞浦路斯相关事务至此皆属英国内政。此后,为确保对塞浦路斯的控制,英国排除了任何改变塞浦路斯主权的可能,并且对当地的管理政策更加严格,这引起了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强烈不满。1931年,愤怒的希腊族人在塞浦路斯东正教會的引领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规模的反英起义,但起义很快便因殖民当局的镇压而宣告失败。<sup>②</sup>起义失败后,英国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塞浦路斯包括政治、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监管,有关希塞合并的活动更是受到严格管控,被迫转入地下。<sup>③</sup>

希腊虽与塞浦路斯有较强的人文联系,但在20世纪50年代前却一直避免介入塞浦路斯相关事务。希腊早期对塞浦路斯的政策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希腊王国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向英国提议,如若同意将塞浦路斯主权移交希腊,那么希腊将永远允许英国军队使用岛上的基地。这种建立“盟国基地”的提案,被韦尼泽洛斯视为实现希塞合并的必要牺牲。因为韦尼泽洛斯明白,如果无法满足与保障伦敦的战略利益,英国人,尤其是殖民当局和海军的高级官员,将永远不会同意让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sup>④</sup>然而,塞浦路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体现的地缘战略价值,让英国拒绝了希腊方面的提案,坚持保留对该岛的所有权。为防止英希就塞浦路斯主权事务出现分歧,影响两国关系,韦尼泽洛斯最

- 
- ① 《洛桑条约》,参见“Treaty Series No. 16 (1923). Treaty of Peace with Turkey, and other Instruments Signed at Lausanne on July 24, 1923, Together with Agreements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Signed on January 30, 1923, and Subsidiary Documents Forming Part of the Turkish Peace Settlement. [With map.],” 1923,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23, Vol. 25, Cmd. 1929.
- ② 1931年塞浦路斯反英起义,参见“Disturbances in Cyprus in October, 1931,” March 1932,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31-1932*, Vol. 6, Cmd. 4045.
- ③ Antonis Klapsis, “EOKA and Anglo-Greek Relations: The View from Athen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8, No. 3, 2019, p. 548.
- ④ 在塞浦路斯建立“盟国基地”的方案,也成为了日后历代希腊政府处理塞浦路斯相关事务的首选方案。参见 Antonis Klapsis,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yprus and the Prospect of Union with Greece, 1919-1931: The Greek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Vol. 41, No. 5, 2013, pp. 769, 777.

终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相关问题。而随着希土战争失败后希腊国力的衰退与对英国依赖性的增长，韦尼泽洛斯进一步决定避免主动提及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并强调有关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英希友好关系的框架内，由此形成了希腊对塞浦路斯的不干涉政策。

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1931 年希腊族爆发反英起义时，韦尼泽洛斯明确划分了希腊政府与这场起义的界限。<sup>①</sup> 此后，除了二战与希腊内战期间的特殊情况外，<sup>②</sup>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不干涉政策几乎是希腊官方处理塞浦路斯相关事务的基本原则。

在塞浦路斯问题出现前，土耳其基本保持着对塞浦路斯的不干涉政策。关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不干涉政策，学者将其归纳为《洛桑条约》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民族主义观的限制。但实际上，在《洛桑条约》签订前，土耳其的民族国家相关法案、战略需求与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就基本奠定了未来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框架。

首先，《国民公约》（Misak-ı Milli）限制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sup>③</sup> 1920 年 1 月 28 日，在凯末尔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议会上通过了《国民公约》，该公约是土耳其人处理民族独立与土地完整性等问题的重要依据。而在其中，塞浦路斯被排除在了土耳其国家领土之外。同时，在民族问题上，该公约旨在将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统一且同质的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土耳其民族主义认同。这也成为日后土耳其

① Antonis Klapsis, “EOKA and Anglo-Greek Relations: The View from Athen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8, No. 3, 2019, p. 548.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遭到德国占领，希腊流亡政府因此向英国提议将塞浦路斯全部或部分割让给希腊，以便希腊王室及政府行使权力，但最终遭到英国的拒绝。希腊内战期间，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希腊国内民众的强烈呼吁下，希腊议会于 1947 年 2 月 28 日决定通过塞浦路斯与希腊联盟的决议，并尝试就此向英国发出呼吁，但英国方面并未予以任何回应。而由于当时内战中的希腊政府需要英国的支持与援助，希腊最终于 1948 年放弃支持希塞合并，恢复了对塞浦路斯的不干涉政策。参见 C. Svolopoulos, “Anglo-Hellenic Talks on Cyprus During The Axis Campaign Against Greece,” pp. 199–217; “News in Brief,” March 1, 1947, *Times Newspapers*, IN50698, GALECS52380769, p. 3; Zeno Rossides, “Greece and Cyprus,” Saturday, March 29, 1947, *Times Newspapers*, IN50722, GALECS85673085, p. 5; “No Change in Cyprus,” Friday, August 13, 1948, *Times Newspapers*, IN51149, GALECS84363021, p. 5.

③ 此观点参见高成圆《土耳其官方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话语构建与转变（1950—1960）》，胥涛主编《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第 175—199 页。

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所努力推行的民族主义观念，即摒弃诸如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等扩张主义，仅将《国民公约》所划定“祖国”疆界内的民众，定义为土耳其民族，从而确保土耳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sup>①</sup>

其次，相比塞浦路斯主权，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上有着更为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塞浦路斯虽与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相关，但在当时，塞浦路斯主权事务却是土耳其最无须担忧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塞浦路斯在一战中体现的战略价值，以及战后对地缘政治平衡的意义，决定了伦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允许希塞合并或该岛主权变更；另一方面，希腊在入侵土耳其失败后国力衰退，其在国家发展与地区事务上更加依赖英国的帮助，这就导致雅典在塞浦路斯主权事务上更加谨慎，雅典担心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诉求会破坏与伦敦的关系。<sup>②</sup> 因此，安卡拉在当时无须担忧塞浦路斯主权变更可能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而相比塞浦路斯主权事务，安卡拉亟待消除《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国家利益的负面影响。在洛桑会议上，安卡拉希望通过放弃对塞浦路斯的主权争夺，换取伦敦在废除《色佛尔条约》问题上的让步。<sup>③</sup>

最后，土耳其当时的国情，以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迫使土耳其放弃提出塞浦路斯主权诉求。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国内经济萎靡，就其国力来说，即使当时安卡拉再度获得塞浦路斯主权，也难以维系在塞浦路斯的开支，以及保障当地局势稳定，反而土耳其的经济可能被进一步拖垮。更为重要的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独立战争影响，土耳其当时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锐减问题。<sup>④</sup> 因此，当时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增加人口

① 笮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45页。

② Antonis Klapsis,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yprus and the Prospect of Union with Greece, 1919-1931: The Greek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1, No. 5, 2013, pp. 771-772.

③ 该观点参见 William Hale, *Türk Dış Politikası 1774-2000*, trans. Petek Demir, İstanbul: Mozaik Yayınevi, 2000, p. 131; Nihat Erim, *Bildiğim ve Gördüğüm Ölçüler İçinde Kıbrıs*, Ankara: Ajans Türk Matbaacılık Sanay, 1976, pp. 1-2.

④ 参见 War Office Intelligence Summary, "Turkey: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stic Movement, 1918-1922," 1923, Volume II, WO [War Office Records,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157/1310.

数量，而非扩展国家版图。《洛桑条约》中与塞浦路斯相关的条款，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相比《色佛尔条约》中奥斯曼帝国放弃塞浦路斯主权和当地土耳其人口，在洛桑会议上，安卡拉为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重新争取到了对国籍的选择权。《洛桑条约》第 21 项条款规定：“1914 年 11 月 5 日在塞浦路斯定居的土耳其国民，应根据当地法律获得英国国籍，并因此失去土耳其国籍。但是，在本条约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他们可选择土耳其国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在行使选择权后 12 个月内离开塞浦路斯岛……”<sup>①</sup>安卡拉希望通过这一条款，让更多生活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回归土耳其，缓解当时土耳其国内的人口危机，并为创造单一土耳其民族社会做好准备。

综上，从《国民公约》的推出到洛桑会议，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政策框架的实质是民族主义，而非塞浦路斯主权。而这一政策框架也在《洛桑条约》中得以体现，并决定了《洛桑条约》对塞浦路斯主权所属的法律效应，最终确立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不干涉政策。

总之，早期英国的战略需求与希土两国的不干涉政策，保证了塞浦路斯主权的稳定与三国在塞浦路斯未来地位事务上的平衡。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平衡却被打破，最终导致塞浦路斯问题正式出现。

## 二 希腊政策调整后塞浦路斯问题的发酵与英土的应对

20 世纪 50 年代初，希腊对其塞浦路斯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打破了自一战后在塞浦路斯未来地位事务上保持的“英国掌握主权，希土不予干涉”局面，导致塞浦路斯问题出现，而该问题的出现令英土有关政策随之改变，进一步导致塞浦路斯问题逐渐发酵。

1951 年 2 月，希腊政府决定支持希塞合并，并坚持就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同英国进行双边谈判，这一决策导致塞浦路斯问题正式出现。<sup>②</sup> 希腊

① “Treaty Series No. 16 (1923). Treaty of Peace with Turkey, and Other Instruments Signed at Lausanne on July 24, 1923, Together with Agreements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Signed on January 30, 1923, and Subsidiary Documents Forming Part of the Turkish Peace Settlement. [With map.],” 1923,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23, Vol. 25, Cmd. 1929, pp. 22-23.

② “The Minister in Greece (Yos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0,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1, Vol. 5, pp. 528-529.

对塞浦路斯政策的调整主要受到当时国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从国际层面来看,国际格局的变化令希腊对英国的依赖性逐渐减弱。随着内战结束后希腊国内局势逐步稳定,以及“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希腊对美国的依赖性大幅提升,对英国的依赖性相应减弱。因此,保障英希关系,不再是希腊面对塞浦路斯未来地位问题时的唯一选择。从国内层面来看,希腊民众对“希塞合并”的热情更加高涨。受1950年1月“塞浦路斯全民公投”<sup>①</sup>的影响,希腊国内对“希塞合并”的呼声不断增强,并开始进一步对政府施压。对于当时的希腊政府来说,为维持内战后国家政权的稳定,需要保证民众的支持。而对塞浦路斯相关事务的处理,将直接决定着希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还可能影响国内局势。所以,在保障英希关系和满足民众诉求两个选项中,希腊政府最终选择了后者,从而介入了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

希腊的介入令塞浦路斯未来主权问题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在希腊介入相关事务前,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仅是英国与塞浦路斯各族群间的问题,是英国直辖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属于英国的内政。然而,随着希腊对塞浦路斯主权产生兴趣,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中介入了其他域外国家,该问题的性质也由英国的内政事务逐渐向地区事务演变,塞浦路斯问题随之出现。

塞浦路斯问题出现之初,英国方面排除了塞浦路斯主权发生改变的可能,并拒绝与希腊就该问题进行双边会谈。20世纪50年代初,地区战略的发展需求与对共产主义渗透的担忧,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在塞浦路斯相关事务上的主要考量。一方面,塞浦路斯对英国在东地中海与中东地区的战略发展有着重要价值。1947年印度独立后,英国比以往更加重视中东地区。在当时,该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英国全权负责的地区,而对这一地区的战略责任则是英国继续保持其世界大国地位的先决条件。<sup>②</sup>但随着在外约

① 1950年1月15日至22日,塞浦路斯东正教会发起了一场塞浦路斯人民(主要为希腊族人)有关塞浦路斯未来地位的公民投票,结果约有96%的投票者希望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这场公投最终没有获得英国的承认,并引起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强烈抗议。参见“96 Percent Vote for Union,” January 29, 1950,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s*; “British Opposition to Union Denounced,” January 18, 1950, *FBIS Daily Reports*; “Cyprus Turks Oppose Church Plebiscite,” January 19, 1950, *FBIS Daily Reports*.

② E. Hatzivassiliou, “The Suez Crisis, Cyprus and Greek Foreign Policy, 1956: A View from the British Archives,” *Balkan Studies*, Vol. 30 No. 1, 1989, p. 109.

旦、巴勒斯坦等地委任统治的结束，英国对中东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更重要的是，英国在中东地区最为关键的埃及苏伊士军事基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面临着《英埃条约》到期撤军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的塞浦路斯，逐渐成为英国替代埃及苏伊士军事基地的不二之选，在这里，英国可以任意行使其主权而不受影响。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直接拥有塞浦路斯主权，远比希腊提议的建立盟国基地的办法稳妥。因为盟国基地的稳定与否，十分依赖与东道国的关系，而在 50 年代前中期，英希关系已经开始出现问题。<sup>①</sup> 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担忧，也是英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重要考量。“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Progressive Party of Working People）是塞浦路斯的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该组织一直在推进希塞合并，并在塞浦路斯拥有一定的民众基础。英国担心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妥协会被塞浦路斯共产党视为软弱，从而进一步刺激共产主义势力借塞浦路斯问题引起骚动，破坏塞浦路斯与地区稳定。<sup>②</sup>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英国官方拒绝就塞浦路斯未来主权向希腊做出任何承诺，并拒绝与希腊进行正式会谈。同时，在几次非正式交涉中，英国还提出了“希腊从未拥有或统治塞浦路斯”“希腊人与塞浦路斯希腊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塞浦路斯在英国统治下将比在希腊统治下更加繁荣”“希塞合并违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意愿”等观点，<sup>③</sup> 试图以此削弱希腊对塞浦路斯主权诉求的合理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塞浦路斯问题出现之初，英国就已经开始考虑利用土耳其对希腊施压。在 1951 年 4 月对塞浦路斯问题的非正式交涉中，英国除了重复以往的观点外，还强调了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利益。<sup>④</sup>

相较于英国的强硬立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出现之初虽表态反对

① 除了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1952 年英国与希腊还在承认埃及法鲁克国王为苏丹国王、英国在希腊商业利益的国有化等其他事务上存在矛盾。参见“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 September 10, 1952,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O 800/796, p. 10。

②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ate at Nicosia,” November 29, 1951, *FRUS*, 1951, Vol. 5, p. 541。

③ 参见“Cyprus (Future),” July 23, 1954, *House of Commons*, Vol. 530, pp. 1841-1848。

④ “The Minister in Greece (Yos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4, 1951, *FRUS*, 1951, Vol. 5, p. 532。

塞浦路斯未来主权变化,但主要秉持一种观望态度,并无意介入相关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泛突厥主义者开始强调塞浦路斯与土耳其的人文联系,此举加强了土耳其民众对塞浦路斯的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土耳其国内出现了大量反对希塞合并的新闻报道与学生示威。1949年12月,在民众的压力下,土耳其官方首次就塞浦路斯未来地位发布声明,其中表达了土耳其反对塞浦路斯主权变化的立场。<sup>①</sup>然而,土耳其官方虽就塞浦路斯未来主权问题发声,但仍无意介入任何塞浦路斯相关事务,这主要和当时土耳其的外交战略相关。40年代末和50年代前期,安卡拉的核心外交战略,是在不影响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发展与希腊等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以求共同抵御苏联的威胁。所以,土耳其在这一阶段极力避免与希腊产生矛盾。在塞浦路斯问题出现之初,希腊的介入并未对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产生实质性影响,土耳其便基本忽视了这一问题,依然将其重心放在改善与希腊的双边关系上。土耳其当时的态度是,只要塞浦路斯继续处于英国统治下,塞浦路斯问题就不存在。<sup>②</sup>

1952~1954年,希腊再次调整其对塞政策,决定打破在英希双边框架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推进该问题的国际化。希腊决定推动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主要是因为“民族自决”的合法化、英希分歧的加剧,以及国内压力的增长。在国际层面,“民族自决”的合法化增加了通过国际化途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可能性。1952年底,联合国提出倡导被殖民地区实行“民族自决原则”。<sup>③</sup>对于塞浦路斯这样一个希腊族占主体(绝大多数希腊族人支持希塞合并)的被殖民地区,给予其“自决”无异于实现希塞合并。更重要的是,随着“民族自决”的合法化,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谈判筹码。面对英国的不妥协立场,希腊希望借由“民族自决原则”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获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从而向英国施压,迫使伦敦做出妥协,同意在英希双边框架内讨论并解决塞浦路

① 参见“Bulgaristan'daki mevkuf subayımız hâlâ iade edilmedi,” ULUS, Aralık 18, 1949, Sayfa 3.

② “Turkey: Annual Review for 1950,” January 8, 1951, *Turkey. Further Correspondence Part V*, 1951, Confidential Print: Middle East, FO 424/291, p. 5.

③ “General Assembly, 7th Session: 403rd Plenary Meeting, Tuesday, 16 December 1952, Headquarters, New York,” A/PV. 403, December 16, 1952,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pp. 367-376.

斯问题,<sup>①</sup> 最终规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双边层面, 英国与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激化。1953 年希腊首相亚历山大·帕帕戈斯 (Alexander Papagos) 与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Robert Anthony Eden) 就塞浦路斯问题的非正式会谈不欢而散。<sup>②</sup> 艾登的强硬态度导致希腊政府开始考虑向联合国提出该问题。对此, 伦敦方面于 1954 年 3 月 15 日在下议院表明了其不妥协的态度。<sup>③</sup> 随之英国女王在政府的建议下, 取消了后续与希腊王室的会晤。<sup>④</sup> 英国的举动反过来又激起了希腊政府与民众的不满, 保罗国王同样在希腊政府的劝谏下放弃了对英国的访问。<sup>⑤</sup> 而后, 希腊政府威胁英国如果不能在 8 月前同意与希腊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讨论, 那么雅典将向联合国提出诉讼。对此, 英国方面于 5 月 1 日在《泰晤士报》发文回应, 其中再度排除了与希腊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可能。<sup>⑥</sup> 1954 年 7 月, 随着撤离苏伊士基地的日期临近, 塞浦路斯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英国因此发布了塞浦路斯“永不独立”的强硬声明。<sup>⑦</sup> 此举不仅导致英希矛盾进一步加剧, 还成了希腊向联合国正式提出塞浦路斯问题的直接导火索。

- 
- ① 在正式通知英国希腊将向联合国提出塞浦路斯问题后, 希腊方面曾暗示, 如果英国公开表示愿意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希腊政府就有可能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推迟到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Greek, Turkish, and Iranian Affairs (Baxter),” April 5, 1954, *FRUS*, 1952-1954, Vol. 8, pp. 685-687。
- ② 1953 年 9 月, 艾登在希腊休养期间会见希腊首相帕帕戈斯。交谈中, 帕帕戈斯尝试在友好且非正式的基础上与艾登交涉塞浦路斯问题, 但被艾登直接拒绝。艾登表示,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 不管是当下还是可预见的未来, 英国都不会考虑塞浦路斯主权的改变, 所以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讨论, 都将不会有任何结果。最后, 艾登还强调塞浦路斯从未属于过希腊, 两国间的唯一关联便是语言和东正教等级制度。参见“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Field-Marshal Papagos in Athens on September 22, 1953,” October 12, 1953, *TNA*, FO 800/796, p. 19。
-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Greek, Turkish, and Iranian Affairs (Baxter),” April 5, 1954, *FRUS*, 1952-1954, Vol. 8, pp. 685-687。
- ④ “For Adeane from Shuckburgh,” March 20, 1954, *TNA*, FO 800/796, pp. 24-25。
- ⑤ “For Adeane from Shuckburgh,” March 20, 1954, *TNA*, FO 800/796, p. 26。
- ⑥ “A Word to a Friend,” Saturday, May 1, 1954, *Times Newspapers*, IN52920, GALE|CS11792 0417, p. 7。
- ⑦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4-55,” June 1955,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4-1955, Vol. 13, Cmd. 9489, pp. 25-26。

在国内层面，帕帕戈斯及希腊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帕帕戈斯当选首相后，当时的塞浦路斯东正教大主教、塞浦路斯希腊族领袖马卡里奥斯三世（Makarios III）开始主张放弃从英希双边层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要求希腊政府向联合国提出该问题。由于马卡里奥斯三世在希腊国内拥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其主张得到了希腊民众的支持，并进一步带动了希腊国内舆论。在这种形势下，如若希腊政府不支持向联合国上诉，那么帕帕戈斯将可能背负背叛希腊民族事业的骂名，而反对派也可能借机发难。<sup>①</sup>

此外，为了获取国际社会对希塞合并的支持，马卡里奥斯三世越发频繁地接触南斯拉夫及叙利亚等铁幕或与苏联交好的第三世界国家。马卡里奥斯三世一度威胁希腊政府，如果希腊不向联合国提出塞浦路斯问题，那么他将向南斯拉夫或叙利亚求助。<sup>②</sup>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1954年8月16日，希腊政府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将“塞浦路斯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列入大会第九届会议的议程。<sup>③</sup> 9月，塞浦路斯问题以9票赞成，3票反对，3票弃权被列入联合国大会讨论项目，<sup>④</sup> 从而正式开启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进程。

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化，英国依旧坚持其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一贯立场，并尝试阻止联合国对该问题的介入。为此，英国一方面私下动员美国、土耳其等盟友反对大会通过希腊的“自决”议案，<sup>⑤</sup> 另一方面则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塞浦路斯相关事务属于英国内政，联合国无权干涉，并要求

① “The Charge in Greece (Yos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26, 1953, *FRUS*, 1952-1954, Vol. 8, pp. 676-677.

② “The Charge in Greece (Yos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 1953, *FRUS*, 1952-1954, Vol. 8, p. 678.

③ “Applica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in the Cas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Island of Cyprus: Report of the 1st Committee,” A/2881, December 16, 1954,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p. 1.

④ “Editorial Note,” Time unknown, *FRUS*, 1952-1954, Vol. 8, pp. 746-748.

⑤ 参见 “In a letter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Asks That the U. S. Support Great Britain’s Policy Toward Cyprus During UN Discussions Dealing with This Matter Sept. 18, 1954,” 1954, White House, GALECK2349647878, p. 1;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and President Eisenhower Discuss British Views on Cyprus,” 1954, White House, GALECK2349283348, p. 1-3.

大会拒绝通过希腊的提案。<sup>①</sup> 最终，在英国、美国、土耳其等多国反对下，联合国否决了希腊的塞浦路斯提案。

面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化，土耳其开始在该问题上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1954 年希腊推动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决策，让土耳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引起了安卡拉的担忧。因为联合国本就倡导在被殖民地区实行“民族自决原则”，<sup>②</sup> 所以，一旦联合国决定介入塞浦路斯问题，那么希腊的“自决”提案将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增加希塞合并的可能性。另外，联合国的介入，也将极大削弱英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主动权，导致该问题的发展出现更多不可控风险。因此，土耳其不再秉承原先的观望态度与不介入原则，决定主动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安卡拉开始要求参与未来任何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sup>③</sup> 并主动寻求与英国在该问题上的合作。为此，安卡拉派出记者代表团访问英国，以便表达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善意。<sup>④</sup> 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也为其之后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以及英土在该问题上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土耳其就塞浦路斯问题的相关行动，不仅代表安卡拉在该问题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更是安卡拉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开端，此后不论是《巴格达条约》的签署还是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谈判，都有土耳其的身影。

总之，1951~1954 年，希腊对塞浦路斯政策的调整威胁到了英国、土耳其两国的相关利益，引起了英希土三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互动，导致塞浦路斯问题逐渐发酵。尤为关键的是，随着塞浦路斯问题的发酵，土耳其对塞政策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给日后土耳其正式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导

① “General Assembly, 9th Session: 477th Plenary Meeting, Friday, 24 September 1954, New York,” September 24, 1954, United Nations, A/PV. 477, pp. 52-53.

② 参见“General Assembly, 7th Session: 403rd Plenary Meeting, Tuesday, 16 December 1952, Headquarters, New York,” December 16, 1952, United Nations, A/PV. 403, pp. 367-376.

③ “The Ambassador in Turkey (Warre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6, 1954, *FRUS*, 1952-1954, Vol. 8, p. 680.

④ 土耳其代表团对英国的访问十分顺利，并达到了安卡拉的主要目的。英国之后同样组成记者代表团，就塞浦路斯问题对土耳其进行了回访。“Turkey: Annual Review for 1954,” January 1, 1955, *Turkey, Further Correspondence Part IX*, 1955, Confidential Print: Middle East, FO 424/295, p. 4.

致该问题复杂化,以及塞浦路斯与地区局势恶化埋下了伏笔。

### 三 英希土三国机制的形成与塞浦路斯问题的复杂化

1955年,英希土三国互动机制逐渐形成,三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互动及相关政策令该问题逐渐复杂化,并演变为影响地区稳定与国际局势的多边问题。在1955~1958年,三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互动大致经历了英土合作对抗希腊、英希土三国相互对立、英土恢复合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5年6月至1957年2月,英国有关塞浦路斯政策的重大调整令塞浦路斯问题正式演化为包括英希土三国在内的多边问题,同时在该问题上形成了英土合作对抗希腊的局势。1955年6月,英国对其塞浦路斯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955年开始,英希土三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互动和相关政策演化导致塞浦路斯与地区局势越发紧张。塞浦路斯方面,1954年联合国否决希腊的塞浦路斯“自决”提案后,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与希腊前陆军上校乔治·格里瓦斯(George Grivas),带领塞浦路斯希腊族武装组织“埃欧卡”(EOKA,为塞浦路斯而斗争的全国性组织)于1955年4月1日发动针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武装袭击,试图通过武装行动的方式动摇英国在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为希塞合并创造机会。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开始,<sup>①</sup>当地局势随之开始动荡,英国的统治因此越发艰难。地区层面上,自联合国大会后,希腊与英国、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更加突出。受此影响,英国皇家海军暂停了对希腊港口的传统访问活动,北约原定于1955年在希腊水域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被迫取消。<sup>②</sup>为避免塞浦路斯问题的发展进一步对北约内部稳定造成冲击,美国要求英国尽快与希腊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会谈,以便早日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对现状的考量以及

①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场较为特殊的民族解放运动,它虽具有一般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殖民主义性质和民族解放性质,但这场运动的初衷是实现“希塞合并”,而非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想要解放的也仅是塞浦路斯希腊族,而非塞浦路斯的所有族群,具有较强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参见张晨锴《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探析》,《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2期。

② “Commons Sitting of Wednesday, 15th June, 1955,” June 15, 1955,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Fifth Series*, Vol. 542, pp. 653-654.

与美国的协商，英国不再坚持拒绝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同意就该问题展开谈判。但同时，英国要求在美国提议的英希双边会谈基础上，邀请土耳其也加入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该提议最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sup>①</sup> 1955 年 6 月，英国向希腊、土耳其发出正式邀请，希望两国参与 8 月在伦敦举办的地中海防御和塞浦路斯主权问题的主题会谈，这次会谈后来被称为“三国伦敦会谈”。

英国举办“三国伦敦会谈”的决策，看似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作出妥协，实则是尝试通过以退为进的手段实现伦敦当时的政治与战略需求。一方面，伦敦希望通过三国会谈深化英土同盟。20 世纪 50 年代，土耳其在英国中东战略中的作用更加突出。<sup>②</sup> 1955 年，随着土耳其促成《巴格达条约》，英国更是将土耳其作为其中东战略的核心伙伴。因此，英国方面特别强调，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要保证土耳其的利益，以及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sup>③</sup> 而塞浦路斯问题关乎土耳其的战略利益，安卡拉也一度表现出主动介入该问题的强烈意愿。因此让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问题，既能满足安卡拉参与该问题的需求，也能进一步深化英土在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另一方面，伦敦希望利用土耳其的介入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实施“分而治之”政策，将希腊、塞浦路斯希腊族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与英国的对抗，逐渐转化为希土两国、希土两族间的对抗，英国则从中脱身成为该问题的调节者与仲裁者。

就土耳其而言，英国举办“三国伦敦会谈”的决策满足了当时安卡拉的部分政治与战略需求。一方面，为抵御苏联的威胁，安卡拉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土耳其-巴基斯坦条约》、组成巴尔干联盟等外交倡议，而这些

① 参见“U. S. Attitude On Cyprus,” October 3, 1955, *Times Newspapers*, IN53341, GALE | CS 135222595, p. 8.

② 在上议院与下议院的相关会议中，英国方面曾指出土耳其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大堡垒，强调安卡拉的意见和对英国中东计划的支持十分关键。参见“Lords Sitting of Tuesday, 23rd February, 1954,” February 23, 1954, *20th Century House of Lord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Fifth Series, Vol. 185, pp. 1078-1079; “Commons Sitting of Wednesday, 28th July, 1954,” July 28, 1954,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Fifth Series, Vol. 531, p. 549.

③ “Commons Sitting of Thursday, 5th May, 1955,” May 5, 1955,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Fifth Series, Vol. 540, p. 1983.

倡议大多需要英国的支持才能实现。<sup>①</sup> 为了进一步获取英国的支持，安卡拉开始寻求与伦敦更加密切的关系，而“三国伦敦会谈”的召开，则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与英国的全面合作提供了途径。另一方面，“三国伦敦会谈”给了安卡拉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争取其权益的机会。塞浦路斯距土耳其南部仅约70公里，对于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一旦土耳其的对手控制了塞浦路斯，将会对土耳其南部极具战略价值的港口和机场产生威胁，从而限制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行动，这也是安卡拉极力反对希塞合并的重要原因。但如果土耳其能够获得在塞浦路斯的军事权益，那么不仅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将得到更好的保障，其在东地中海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射，以及军事行动能力也将大幅增强。因此，土耳其欣然接受了会谈邀请，主动介入了塞浦路斯问题。

就希腊而言，英国举办“三国伦敦会谈”的决策令其陷入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如果接受邀请参与“三国伦敦会谈”，那么相当于希腊承认了土耳其参与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的权利。同时给予了英国通过“分而治之”政策阻碍希塞合并的机会，并可能对希土关系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由于伦敦已然在相关问题上作出妥协与和解的姿态，如若拒绝邀请，那么希腊可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完全失去美国、北约的善意。<sup>②</sup> 面对艰难的决策，希腊政府最终决定接受邀请参加“三国伦敦会谈”，并根据会谈结果再制定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下一步行动计划。<sup>③</sup>

“三国伦敦会谈”对塞浦路斯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国伦敦会谈”令土耳其完全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导致该问题复杂化。在“三国伦敦会谈”前，土耳其虽公开表达过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态度及参与相关事务讨论的意向，但受《洛桑条约》限制，土耳其无权干涉塞浦路斯任何事务。然而，英国举办“三国伦敦会谈”时，却将塞浦路斯现状及未来主权等问题置于

① “Turkey: Annual Review for 1954,” January 1, 1955, *Turkey, Further Correspondence Part IX*, 1955, Confidential Print: Middle East, FO 424/295, p. 4.

②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Greece,” July 1, 1955, *FRUS*, 1955-1957, Vol. 24, pp. 273-274.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6, 1955, *FRUS*, 1955-1957, Vol. 24, pp. 274-275.

东地中海与中东地区防御事务的讨论范畴,<sup>①</sup> 从而令塞浦路斯问题从英国的内政事务上升为地区事务, 土耳其因此不再完全受制于《洛桑条约》, 合理地介入了塞浦路斯问题。该问题至此也由最初的英、希双边问题, 进一步演化为更加复杂的英、希、土三方的多边问题, 并在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地区稳定与国际局势的热点问题。

另外, “三国伦敦会谈” 正式确立了英土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合作关系。在“三国伦敦会谈” 前, 英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合作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 而英国举办“三国伦敦会谈”, 看似公平给予希、土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话语权, 实际目的是让同样反对希塞合并的土耳其合理介入塞浦路斯问题, 从而在该问题上孤立希腊。因此, 在“三国伦敦会谈” 时, 希腊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主张与提议皆遭到了英、土的否决, 而希腊推动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行为更是受到了两国批判。<sup>②</sup> 土耳其代表还特别强调, 如果英国放弃塞浦路斯主权, 那么该岛应重新归土耳其所有, 而英国方面则隐晦地承认了这一说法。<sup>③</sup> 最终, 由于希腊与英国、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当前问题与未来发展方面无法达成共识, 会议以失败告终。但是, 英国举办此次会谈的目的已然达到。自“三国伦敦会谈” 开始,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逐渐形成了英国、土耳其联合压制希腊的局面。

在之后的 1956 年至 1957 年 2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 不论是在双边层面还是国际层面, 英土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双边层面上,

---

① 参见“Miscellaneous No. 18 (1955), The Tripartite Conference o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Cyprus-held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Greece and Turkey, London, August 29-September 7, 1955 [With Relevant Documents],” October 1955,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5-1956*, Vol. 41, Cmd. 9594, pp. 6-7.

② 参见“Miscellaneous No. 18 (1955), The Tripartite Conference o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Cyprus-held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Greece and Turkey, London, August 29-September 7, 1955 [With Relevant Documents],” October 1955,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5-1956*, Vol. 41, Cmd. 9594.

③ 参见“Miscellaneous No. 18 (1955), The Tripartite Conference o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Cyprus-held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Greece and Turkey, London, August 29-September 7, 1955 [With Relevant Documents],” October 1955,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5-1956*, Vol. 41, Cmd. 9594, pp. 19-25.

英国、土耳其就拉德克利夫(Lord Radcliffe)草拟的“塞浦路斯宪法提案”<sup>①</sup>达成共识。<sup>②</sup>国际层面上,英国、土耳其在1957年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保持着统一阵线,两国代表在大会上相互声援,继续压制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声音,阻止联合国通过希腊有关塞浦路斯的“自决”提案。<sup>③</sup>

第二阶段:1957年3月至1958年8月,由于英土合作破裂,英希土三方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互动开始呈现一种相互对立的局面,塞浦路斯及地区局势因此恶化,塞浦路斯问题也越发复杂。1957年2月联合国大会后,英国与土耳其在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的释放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合作破裂。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后,英国在与希腊、土耳其讨论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还尝试从塞浦路斯内部寻找其他解决途径。1955年9月陆军元帅约翰·哈丁(John Harding)担任塞浦路斯总督后,除了利用军事手段恢复塞浦路斯局势,他还在伦敦的授意下,尝试通过谈判的方式,说服马卡里奥斯三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让步,以便利用大主教在宗教与世俗中的双重影响力,令“埃欧卡”与希腊族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妥协。然而,在经历了多轮谈判后,<sup>④</sup>马卡里奥斯三世仍坚决支持“自决”,谈判因此破裂。而作为对马卡里奥斯三世拒绝妥协的惩罚,1956年3月,英国殖民当局以马卡里奥斯三世利用暴力来达成政治目的的罪名,将其流放塞舌尔群岛。<sup>⑤</sup>英国此举导致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愈

① 塞浦路斯的“自决”提案即拉德克利夫草拟的“塞浦路斯宪法提案”。参见“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Cyprus.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by the Right Hon. Lord Radcliffe, G. B. E.,” December 1956,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6-1957, Vol. 10, Cmnd. 42。

② 该提案最终因希腊的强烈反对,以及塞浦路斯国内“埃欧卡”与殖民当局持续的军事冲突而未能实行。参见“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6-57,” June 1957,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6-1957, Vol. 10, Cmnd. 195, pp. 42-43。

③ 参见“Summary Record of the 847th Meeting: 1st Committee, Held at Headquarters, New York, on Monday, 18 February, 1957, General Assembly, 11th Session,” February 18, 1957, United Nations, A/C. 1/SR. 847; “Summary Record of the 848th Meeting: 1st Committee, Held at Headquarters, New York, on Monday, 18 February 1957, General Assembly, 11th Session,” February 18, 1957, United Nations, A/C. 1/SR. 848。

④ 马卡里奥斯三世与塞浦路斯总督哈丁就塞浦路斯问题谈判的书信往来可参见“Cyprus, Correspondence Exchanged Between the Governor and Archbishop Makarios,” March 1956,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5-1956, Vol. 35, Cmnd. 9708。

⑤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5-56,” May 1956,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5-1956, Vol. 13, Cmnd. 9769, pp. 39-40。

演愈烈，塞浦路斯局势随之愈发动荡。1957 年 3 月，英国认为继续流放马卡里奥斯三世，不仅无法稳定塞浦路斯局势，还会导致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受阻。于是，英国决定结束对马卡里奥斯三世的流放（英国虽然结束了马卡里奥斯三世的流放，但禁止他返回塞浦路斯，后将其送往雅典）。但这一决策被土耳其视为英国向希腊与暴力的妥协，从而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安卡拉认为释放马卡里奥斯三世，将鼓励塞浦路斯希腊族使用暴力来达成其目的，而暴力的不良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希土矛盾，土耳其国内媒体与舆论更是因此抨击英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背叛了土耳其。<sup>①</sup> 该事件导致土耳其质疑英国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能力，安卡拉因此中断了与英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合作，不再接受伦敦提出的相关解决方案，并要求立即对塞浦路斯实行“分治”，即“将塞浦路斯人口和土地一分为二，希腊与土耳其平等地对各自民族社区进行管理”。<sup>②</sup>

“分治”的想法最初是由土耳其驻伦敦大使富阿特·哈里·乌尔古普鲁（Fuat Hayri Urguplu）于 1956 年 6 月 18 日提出的，<sup>③</sup> 在英土出现分歧前，两国已达成共识将“分治”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备选方案之一。<sup>④</sup>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此前英国已经承认了该方案的可行性，但当土耳其要求立即实施分治时，英国却并不打算付诸实践。因为一旦在塞浦路斯实行分治，将可能导致希土两国因利益之争而爆发直接冲突，英国也将可能被追究滥用社会冲突，以及分裂塞浦路斯的责任。同时还可能给类似爱尔兰分裂主义者等分裂分子，提供危害英国领土完整的机会。<sup>⑤</sup> 所以，伦敦方面仅将塞浦路斯的分治停留在理论层面，未曾真正考虑这一方案，承认分治最初也只是英国通过“分而治之”维持各方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平衡的策略，英国希望借此向希腊进

① “Turkish Reactions to Release of Archbishop Makarios,” April 12, 1957, *Turkey. Further Correspondence Part XI*, Confidential Print: Middle East, FO 424/297, pp. 23–25.

②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7–58,” June 1958,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7–1958, Vol. 9, Cmnd. 451, p. 37.

③ David French, *Fighting EOKA-The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 on Cyprus, 1955–19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89–190. From: TNA CO 926/551. Foreign Secretary to Bowker, June 20, 1956.

④ “Lords Sitting of Wednesday, 19th December, 1956,” December 19, 1956, *20th Century House of Lord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Fifth Series, Vol. 200, p. 1256.

⑤ Cemal Yorgancıoğlu & Şevki Kırpalp, “Turco-British Relations, Cold War and Reshaping the Middle East: Egypt, Greece and Cyprus (1954–195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19, p. 11.

一步施压,并保证英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合作关系。

为避免立即实施分治方案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英国提出了一项“三国共治”的折中方案。该方案提议英国、希腊、土耳其三国对英属塞浦路斯主权基地以外区域实行共同管理。根据英国的初步计划,希土两国将各选出一名代理与英国总督共同监管塞浦路斯并促进当地的自治,自治政府将以宪法为基础。<sup>①</sup>然而“三国共治方案”未能弥合英希土三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分歧。希腊认为该方案与安卡拉提出的“分治”方案一样,目的都在于将希腊在塞浦路斯的部分权益转移给土耳其,给予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直接权利。因此,希腊政府坚决抵制这一方案,坚持塞浦路斯的“自决原则”。<sup>②</sup>土耳其则仍然要求立刻实现对塞浦路斯的分治,拒绝接受除分治外的任何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

至此,塞浦路斯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英希土三国分别就该问题提出了三种不同解决方案——英国希望通过“三国共治方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希腊坚持在英希双边范畴内实现塞浦路斯的“自决”;土耳其要求立即执行对塞浦路斯的“分治”。三方各执己见,都要求将自己的方案作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途径,三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互动及相关谈判因此陷入僵持。

1957年末至1958年8月,英希土三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导致整体事态发展不断恶化。1957年10月,塞浦路斯新任总督休·富特(Hugh Foot)开始尝试通过较为平和的方式缓和各方矛盾,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为此,富特主动缓和殖民当局与“埃欧卡”的关系,并决定就塞浦路斯问题访问希腊与土耳其。

富特此举被土耳其视为英国向希腊进一步妥协的信号,安卡拉因此开始进一步鼓吹对塞浦路斯的分治。1958年1月,富特前往土耳其期间,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在安卡拉的引导下,在塞浦路斯的主要城镇举行了支持分治的示威活动。这次活动一度引发土耳其族与英国安全部队的冲突,最终造成7名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死亡。<sup>③</sup>1958年5月,土耳其再次就塞浦路

① “Editorial Note,” Time unknown, *FRUS*, 1955-1957, Vol. 24, p. 500.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Gree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4,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0, pp. 586-587.

③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7-58,” June 1958,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7-1958, Vol. 9, Cmnd. 451, p. 39.

斯问题向英国施压。安卡拉表示英国必须将塞浦路斯问题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来解决，而英国与土耳其的同盟能否持续，也将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sup>①</sup> 英土间的氛围因此更加紧张。

对于土耳其推进分治方案的举措和英国模棱两可的态度，希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雅典拒绝承认土耳其为塞浦路斯问题的“直接当事人”，反对土耳其的“分治”方案。雅典甚至表态：一旦对塞浦路斯实施分治方案或是让土耳其人获得塞浦路斯部分主权，那么希腊将可能让塞浦路斯变为一个“火药桶”。<sup>②</sup>

1958 年 6~8 月，希腊与土耳其就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的分歧，引发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之间持续的暴力冲突，<sup>③</sup> 导致塞浦路斯及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其间，土耳其向希腊发出了战争威胁，<sup>④</sup> 希腊则将土耳其伊兹密尔北约总部的希腊人员全部撤离，并切断了北约东南欧司令部内与土耳其的所有军事联系，驻扎在土耳其边境的希腊军队也由此进入戒备状态。<sup>⑤</sup> 两国几乎处于战争边缘。直至 8 月 4 日，随着英希土呼吁下塞浦路斯两族冲突的结束，希土间的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然而因为塞浦路斯问题悬而未决，所以整体局势仍不容乐观。而发展至此，塞浦路斯问题已然成为当时影响地区与国际局势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第三阶段：1958 年 8 月，英土就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恢复了两国就该问题的合作。1958 年 8 月，时任英国首相的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Maurice Harold Macmillan）经过对“三国共治方案”的改进与完善，推出了一项新的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该方案提议，在保证塞浦路斯国际地位七年不变的前提下，在塞浦路斯不同族群社区设立不同的

① “Turkish Fears on Future of Cyprus,” Tuesday, June 3, 1958, *Times Newspapers*, IN54167, GALE|CS151214787, p. 9.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Gree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4,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0, pp. 586-587.

③ 这场冲突从 1958 年 6 月 7 日的土耳其族“反希腊暴乱”开始，到了 7 月的第二周，两族间的谋杀、纵火，以及破坏活动达到高峰，有 30 余人被杀害。8 月 4 日，在英国、希腊首相及土耳其总理的共同呼吁下，冲突才勉强停止。“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8-59,” Cmnd. 780, June 195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Online*, U. K. Parliamentary Papers, pp. 39-41.

④ 参见“Ankara Welcomes Athens Move,” *Times*, June 10, 1958, p. 10.

⑤ “Editorial Note,” Time unknown, *FRUS*, 1958-1960, Vol. 10, p. 646.

行政与立法机构,各族群在各自的社区事务中实行自治,而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将与总督合作,分别参与对希、土两族社区的管理。这一方案便是著名的“麦克米伦方案”。<sup>①</sup> 该方案看似是在推行塞浦路斯的自治,实则是在英土希三国共享塞浦路斯主权的情况下,让塞浦路斯两族分别自治,是英国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具象化表现。因此,雅典将该方案描述为“最糟糕的”“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方案,并认定这是英国和土耳其共谋的最直接证据。<sup>②</sup> 面对希腊的反对,英国坚持认为“麦克米伦方案”才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终方案,并决定将于10月在塞浦路斯强制实行该方案。为了能够让“麦克米伦方案”顺利实施,英国先是说服了美国支持该方案,然后又与美国共同说服了土耳其。为响应“麦克米伦方案”,1958年9月29日,应英国邀请,土耳其任命了土耳其驻塞浦路斯代表,以便为“麦克米伦方案”的实施做准备。<sup>③</sup>

“麦克米伦方案”的强制实行令塞浦路斯出现分裂危机,引发了希腊政府的强烈抗议。希腊政府认为英国、美国、土耳其甚至整个北约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抛弃了希腊。为抵制这一方案,希腊发出了退出北约的威胁。<sup>④</sup> 而塞浦路斯希腊族武装组织“埃欧卡”则发动了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以来最为高频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岛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塞浦路斯局势再度恶化。<sup>⑤</sup>

“麦克米伦方案”在引发北约内部危机与塞浦路斯局势危机的同时,也给塞浦路斯问题带来了转机。为避免北约内部与塞浦路斯局势进一步恶化,英美及北约开始积极斡旋塞浦路斯问题,各方的态度因此有所缓和,并就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途径再次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希腊政府与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决定放弃“自决”,实现塞浦路斯的“独立”,即既不“合

① 麦克米伦方案,参见“Cyprus. Statement of Policy,” 1958,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7-1958, Vol. 24, Cmnd. 455.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Gree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0, pp. 684-685.

③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8-59,” June 1959,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8-1959, Vol. 10, Cmnd. 780, pp. 41-42.

④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Gree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4,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0, pp. 725-726.

⑤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8-59,” June 1959,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958-1959, Vol. 10, Cmnd. 780, p. 41.

并”也不“分治”，而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sup>①</sup> 该方案提出后得到了北约与国际社会的支持。

最终，在 NATO、联合国的斡旋下，英希土几位北约成员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在 1959 年 2 月确定了以《苏黎世-伦敦协定》草案为基础的塞浦路斯独立方案。<sup>②</sup> 随之英希土三国关系得以缓和，塞浦路斯紧张局势逐步平息，塞浦路斯问题也暂时告一段落。

## 结 语

在冷战背景下，20 世纪 50 年代英希土互动与相关政策演化导致塞浦路斯问题的出现与复杂化，最终令该问题演化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局势的热点问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塞浦路斯问题的发展进程中，希腊于 1951 对塞浦路斯未来主权事务的介入令塞浦路斯问题正式出现，并引发了希腊与英国殖民统治者就该问题的分歧。而后 1954 年希腊推动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行为则导致该问题进一步发酵，促使土耳其开始尝试介入相关问题，并令英土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趋于合作，该问题也出现了向英希土三国机制演化的趋势。1955 年英国通过“三国伦敦会谈”让土耳其完全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从而正式确立了该问题的三国机制，塞浦路斯问题随之由英希双边问题演化成为更加复杂的英希土三方介入的多边问题。而随着土耳其因素的介入，塞浦路斯问题的发展逐渐脱离控制，<sup>③</sup> 引发了英希土三国在该问题上的争议与矛盾，进而造

① 雅典主张塞浦路斯在英联邦内部或外部独立，马卡里奥斯三世则表示将接受联合国保证下塞浦路斯的独立。参见“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8,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0, pp. 688-690;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58-59,” Cmnd. 780, June 195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Online*, U. K. Parliamentary Papers, pp. 41-42.

② 《苏黎世-伦敦协定》是塞浦路斯宪法的框架。《苏黎世-伦敦协定》具体内容，参见 Murat Metin Hakki, *The Cyprus Issue—A Documentary History, 1878-2007*,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07, pp. 31-39.

③ 国内较为权威的塞浦路斯问题研究成果认为英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塞浦路斯问题上掌握着较强的主动权。（相关观点参见何志龙《塞浦路斯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3，第 25、34~35 页；何志龙《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商务印书馆，2005，第 174、197~198 页。）但本文却认为，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后，为保证安卡拉的支持，英国对该问题的相关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耳其的意见，英国的主动权被极大削弱。

成 1957~1958 年塞浦路斯与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塞浦路斯问题也因此一举成为当时最为棘手的地区与国际问题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英希土三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互动及相关政策，也对后续塞浦路斯问题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在 20 世纪 50 年代塞浦路斯问题发展进程中，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以及希土两国就“希塞合并”与“分治”的争议，加剧了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间的矛盾，引发了两族暴力冲突，最终造成塞浦路斯的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则成为日后两族冲突频发，从而多次引起塞浦路斯问题发酵的导火索。另一方面，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博弈，英希土三方最终获得了在塞浦路斯的驻军权，以及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权利，<sup>①</sup> 从而确立了对塞浦路斯的干预机制。这也是日后塞浦路斯问题再度发酵之际，希腊、土耳其两国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干预塞浦路斯局势，从而引发塞浦路斯危机，并最终导致 1974 年塞浦路斯分治的重要原因。

此外，20 世纪 50 年代英希土三方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博弈对三国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希土关系造成了严重打击。而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至今仍是影响北约内部团结与稳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责任编辑：张向荣]

① 在《苏黎世-伦敦协定》的基础上，英希土三方还通过了《塞浦路斯共和国与希腊、联合王国及土耳其保证条约》，该条约赋予了三国在塞浦路斯的政治与军事权利。《塞浦路斯共和国与希腊、联合王国及土耳其保证条约》参见 Murat Metin Hakki, *The Cyprus Issue—A Documentary History, 1878–2007*,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07, pp. 39–41。

## The Tripartite Interaction Between Britain, Greece and Turkey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yprus Issue in the 1950s

Zhang Chenkai / 127

**Abstract:** The Cyprus issue is an international issue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na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great power disputes, and the 1950s is the key period when this issue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hot issue. The involvement of Greece in the future sovereignty of Cyprus in 1951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yprus problem and caused a disagreement between Greece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rs over the issue. In order to force Greece to give up it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Cyprus, in 1955 Britain made Turkey, which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Cyprus and opposed to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Cyprus, formally intervene in the Cyprus issue through the Trilateral London Talks. Subsequently, the issue evolved from a bilateral issue between the UK and Greece to a more complicated tripartite issue between the UK and Greece and caused disputes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on related issues, which led to the continuous turmoil in the situation of Cyprus and the region during 1957-1958, and the Cyprus issu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tractabl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t that time. Although the issue ended in 1959 with the consensus reached on the “independence” of Cyprus, the national issue of Cyprus and the interference of major powers caused by the game between Britain, Greece and Turkey during the 1950s remaine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peated ferment of the Cyprus issue in the future, which led to local and regional instability, and led to the eventual partition of Cyprus.

**Keywords:** Cyprus Problem; British-Turkish Relations; Turkish-Greek Relations; British-Greek Relations; NATO

## U. S. Government Health Assistance to Saudi Arabia Under the Point Four Program (1952-1954)

Chen Qian / 153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successively signed Point Four General Agreement and Health Program Agreement. Under Truman's slogan of removing the “blot upon civilization,” the Health & Sanitation Div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perations Mission to Saudi Arabia and the Saudi